

俄罗斯的恶之花（一）

——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及其后人道主义文学创作

王宗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语系，洛阳 471003）

提 要：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叶罗菲耶夫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两把利剑挑战文学中的美学传统和社会学中的伦理传统，借助苏维埃时代的历史经验和西方同行的精神分析理论，深刻挖掘植根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人性之恶。从性恶论出发，他逐步颠覆了从启蒙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苏维埃时代愈演愈烈的人的神话，从而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深刻认识，创立了新的后人道主义观念，为传统的俄罗斯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后人道主义；消解人的神话

中图分类号：H106.99

文献标识码：A

叶罗菲耶夫 1947 年生于莫斯科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父亲曾任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所以他 8 岁时就去了巴黎，早早就接受了西欧各种思潮的影响。1965 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成为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1975 取得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法国存在主义》。

早期的叶罗菲耶夫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60 年代末期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1973 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一举成名。70 年代叶罗菲耶夫开始文学创作，同样不同凡响，早期的几部文学作品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好评。1979 年他因为组织和参与编辑地下文学刊物《大都会》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直到 1988 年才重新恢复其作协成员的身份和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截止 2008 年他一共出版了 17 部作品，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俄罗斯美女》（1990），短篇小说《和白痴一起生活》（1980），文学哲学随笔集《在诸多该死问题的迷宫里》（1996），以及他主编的俄罗斯新小说集《俄罗斯的恶之花》（1997）等。叶罗菲耶夫的作品在国外享有盛誉，被翻译成 27 种文字。仅《俄罗斯美女》就被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被誉为“第一本在俄罗斯出版的国际畅销书”。此外，叶罗菲耶夫还长期主持“文化”频道的《伪经书》栏目，是俄罗斯国际笔会中心会员。1992 年荣膺纳博科夫文学奖。

1 文学的异教徒

俄罗斯著名作家扎米亚京曾经说过，“……真正的文学不是由那些忠于职守、政治上可靠的官员创造的，而是由狂妄分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叛逆者、怀疑论者创造的”。（扎米亚京 2000：63）叶罗菲耶夫就是苏维埃文学阵营里的一个离经叛道、不畏强权的异

教徒。早在《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1973）一文中，他就涉足了苏维埃时期的禁毁话题（当时大多数苏联作家对萨德的理解仅限于“施虐狂”的直解），并大胆为臭名昭著的 18 世纪色情作家萨德正名。他认为，萨德主义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文化现象，而不是所谓的精神病或者性变态。萨德作为思想家完成了对启蒙时代哲学的总结，作为作家则继承了洛可可文学对色情主题和哲理小说的偏好。叶罗菲耶夫把萨德称为“自由倾听某些话语真理的作家”，强调真正的创作具有非理性的特质，而作家只是上帝和作品之间的一个特殊媒介。时隔两年，他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又挑起一个被苏维埃当局禁止的话题：《论被禁的侨民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孤独哲学和文学美学信仰》。叶罗菲耶夫在此文中明确了一个观点：说假话的艺术家必将得到缪斯的惩罚，最终难逃江郎才尽的命运。因为这篇文章，苏共中央委员会批评杂志犯了“意识形态的错误”，同时剥夺了叶罗菲耶夫去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机会。

然而叶罗菲耶夫并没有因为当局的惩罚而变得驯服。1977 年的某一天他又突发奇想，要为官方文学所排斥的“流浪文学”举办一个公开的展览。于是乎，在几个青年作家叶·波波夫、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等人的响应下，他们着手编撰《大都会》文集，并准备于 1979 年 1 月 23 日首发。未料此事被当局知晓，苏联作协认为文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禁止在国内外发表。其结果是举行文集首发式的咖啡馆遭到克格勃的查封，参与其中的作家均被处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都会”事件。在对叶罗菲耶夫的处理上当局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么写悔过书，要么牺牲父亲的政治前途。叶罗菲耶夫在父亲的支持下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向当局低头。当然他自己也付出了代价：被开除出作协，作品禁止在国内发表。

1990 年，重新获得在国内发表作品权利的叶罗菲耶夫再次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在《文学报》上以一篇题为《悼亡苏维埃文学》的文章宣告了主流文学的死亡。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引发了 250 多篇文章的回应，成为声噪一时的文学事件。在这篇言辞犀利的悼文中，叶罗菲耶夫对苏维埃文学作了如下定性：“苏维埃文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外加作家人性弱点的产物，这些弱点包括：追名逐利，与官方媾和以及与宗教领袖或野心勃勃的帝王沆瀣一气”。他认为，苏维埃时期文学的悲剧在于：“作家们长期以来为了生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更糟的是，违背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把斯大林之后的苏维埃文学分为半官方文学，农村文学和自由派文学，然后逐一分析了这三种文学的衰亡气象。与此同时，他指出，在苏维埃文学的废墟上正在兴起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这种文学愿意与任何文化（不论时空上多么遥远）进行对话，从而创建起多语义多文体的结构。他希望新文学能够摒弃苏维埃文学过多的社会政治因素和道德说教，真正回归到文学本身。1997 年，叶罗菲耶夫把对新文学的期望转化为行动，主编了代表新文学的文集《俄罗斯的恶之花》。这部文集不仅是对苏联文学的反叛，也是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反叛：作品不再以传统的道德价值为准绳，而是以恶的诗学、暴力的诗学、病态和恐惧的诗学为指针。

2 “人道主义神话”的消解者

自启蒙时代以来，在理性主义光芒的烛照下，人被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他光明、美好，富有理性，无所不能。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的美好的想象，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塑造。20 世纪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颠覆了理性主义关于人的神话，拟定出新的人的观念：人是意识+无意识+超意识的混合体，而且意识和无意识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叶罗菲耶夫将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对人的观念的转变称为“人道主义的第二次覆灭”。他认为，传统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的人的观念。叶罗菲耶夫对人的理解不带任何幻想，完全是批评的眼光。他把重估人的价值看作一种人类学现象，拒绝对人进行理想化的阐释。在随笔《人道主义的第二次覆灭》中他写道：“从 60 年代文学到新的文学浪潮，文化里首先表达的是对人的看法急剧朝坏的

方向转变。人道主义的覆灭有其合理的怀疑主义因素，因为，人身上的恶根深蒂固，要远比那些‘社会学家’和坚定的民主人士们认为的深，它存在于最深处，从那里日渐兴起的德·萨德正温柔地看着我们”。（B. B. Ерофеев 1996: 442）

基于此，叶罗菲耶夫对俄罗斯经典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观念提出了质疑。在《俄罗斯的恶之花》一文中他举了《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话为例：“人是好的，环境太差”。叶罗菲耶夫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整个 19 世纪文学的注解。他说，19 世纪俄罗斯作家们与糟糕的社会环境进行的勇敢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考量，他们实际上没有余力去思考深刻的哲学人类学问题。所以，尽管俄罗斯文学丰富多样——独树一帜的心理描写，纷繁多样的文体风格，以及执着深入的宗教探索，但其总的基调是在创立一种希望的哲学，表达对美好未来的一种乐观的信念。（B. B. Ерофеев 1997: 8）这一观点尽管有失偏颇（想一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能明白），但也道出了俄罗斯文学的某种特质。早在 20 世纪初，索洛古勃就用《卑微的魔鬼》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作家认为，“恶具有的不是社会意义，而是广泛而自由地散播在人的心底。希望的哲学对此根本无济于事”。（B. B. Ерофеев 1997: 9）然而，俄罗斯文学并不想抛开乐观主义的幻想。在苏维埃时代禁止把人道主义学说批评为抽象的乌托邦思想，因为它动摇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所以，“苏维埃思想家们将人道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亲共产主义的哲学学说与仁爱思想混为一谈，将任何怀疑人道主义的人视为人类的敌人。这催生了苏维埃文化中“人道主义的狂欢”（普拉东诺夫语）。（B. B. Ерофеев 1997: 10）而这种抽象概念的狂欢掩盖了“人的消失”的实质，加剧了人道主义的解构进程。

叶罗菲耶夫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层面，而是走得更远，进入到人的本质属性的哲学思考层面。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追究国家的罪责，而在于揭示出人在类似环境中的真实自然属性，这种属性也许是传统人道主义所忽略的人性中恶的部分：“……正是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人，即人道主义的主体，展示了人在特定环境下恶的一面：卑鄙下流，背叛，见风使舵，低俗，施虐，堕落，蜕化；最后证明，其实人可以无所不为”。（B. B. Ерофеев 1997: 10）古拉格群岛骇人听闻的生活环境映照出人本身的可怕。尽管如此，无论在官方文学还是自由派文学中依然在继续鼓吹人道主义。所有的罪行归咎于斯大林及其爪牙，至多还有制度。人民只是受害者。但人们逐渐意识到，极权社会是一部“共同完成的作品”，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能轻易造就的。所以必须抛弃关于人与群众的教条观念，重新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新人”乃至人本身的怀疑。出现了充满对人的怀疑的文学。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说，“新文学的意义不在人种学方面的真实性，也不在于对国家的揭露，而是表明，在脆弱的文化外壳下人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动物”。（B. B. Ерофеев 1997: 22）于是，充满怀疑精神的新文学消解了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建立起新的后人道主义观念。

正是基于这种后人道主义观念，叶罗菲耶夫的文学创作致力于颠覆苏维埃时代把人视为超人的神话。所以他的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英雄浪漫主义”的人的观念。为了打破“人神美学”的坚壁，作家专门选取一些与苏维埃文学正面英雄孑然对立的人物形象：疯子，白痴，怪胎，变态狂。然后作品里总是充斥着大量低级粗俗的词汇，充满了对肉欲色情的关注，作家的意图很简单：用这种所谓的“肮脏的现实主义”去消解苏维埃文学所创造的人的神话。

3. 俄罗斯的恶之花

叶罗菲耶夫后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他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充盈世界的万恶之源，人的存在是一种“恶”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人身上的恶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相反，他常常呼吁要现实地理解人，不要粉饰，而要看到人身上隐藏的无法预料的危

险因素，看到他身上的动物本能。人的天性是历史进化外加某些天生的生物冲动的产物。如果不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心理机制，就无法理解社会现象。

叶罗菲耶夫的后人道主义思想在很多方面得益于德·萨德的理论。萨德认为恶是一种对他人表示权力的形式。他笔下的人不承认他人的价值，常常化身为暴君或刽子手，只关注自己的幸福。他的“主权”意味着否定他者的主权。他所操的唯一语言是暴力的语言。在随笔《萨德，萨德主义和 20 世纪》中叶罗菲耶夫介绍了萨德的哲学和萨德式的主人公（性放纵者）。他指出，萨德仿佛预见到人在通往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必定要犯的可怕罪行。因为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一定会引发人的自动完善，相反倒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促使人显露出恶的本性，断绝与人的联系。

叶罗菲耶夫塑造了自己的萨德式的艺术世界，其中主要有施虐型、施虐-受虐型和恋尸癖型几种类型。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对萨德的理论作了某些修正。传统上施虐症，施虐-受虐症和恋尸癖被视为一种罕见的心理病态现象，往往和性暴力相联。叶罗菲耶夫指出，萨德主义（施虐）不仅存在于性暴力中，它还具有各种变体形式，表现为权利欲和独裁专制。“真正的历史施虐者要比德·萨德的主人公奸猾百倍，他靠欺骗、伪善、伪装而生存，而且他伪装的手段十分高明，常常扮演人类朋友的角色。（B. B. Ерофеев 1990: 242）所以，作家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赋予读者另一种视力，让他们能够看清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萨德主义。最为典型的是作家 80 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小鸚鵡》，《和白痴一起生活》，《少女与死神》以及《三次约会》。

3.1 《小鸚鵡》：植根于权力欲望的普遍施虐现象

短篇小说《小鸚鵡》揭示了权力领域中的萨德主义。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刽子手如何冠冕堂皇地折磨并杀害一个无辜青年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身上有斯大林时代刑侦人员的影子，他办案不单单是履行职责，他喜欢折磨、摧残、侮辱自己的受害者，然后再把他弄死。拷问和刑讯对他来说仿佛在经历一场独特的、能引起他高潮的浪漫恋情。他很享受自己对他者的无上权力，并以各种施虐练习表达对受害者独特的“爱”。

正如萨德的主人公一样，叶罗菲耶夫的施虐者-刽子手“想让每一种东西都能获得不朽”，为的是能够持久地享受折磨他人的幸福。因此他并不急于处死受害者，尽管他们在严刑逼供下都招认了他想要的“犯罪事实”。只有当从受害者身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且自己施虐的想象力枯竭的时候，他才认为案件可以了结了。这时候他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绘着这一节日的心情：“一条河如银蛇般贯穿整个城市，在河的对岸高地上立着一片松林，简直美极了！斯皮利顿先生，你不知道闻着草的芳香心情有多好。是三叶草的味道，馥郁的香气。太美了！”再过一分钟犯人将命丧黄泉。施虐者统治着钟楼顶端，感觉自己是他人命运的主宰。

小说的叙事形式别具特色。刽子手的自述语言不是他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行使暴力的语言，而是权力本身的语言，这种权力不仅为暴力寻找名正言顺的口实，而且还赋予它崇高的意义。例如，施虐者语言中一些典型的苏联时期的宣传用语：“我对自己的工作很熟悉，所以一听刑讯人的叫声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您的儿子，叶尔莫拉伊·斯皮利顿诺维奇，之所以想弄活死去的鸚鵡，其目的是要证明洋鸟比我们的家雀优越，并以此打击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难堪，出丑”。从这些反映了时代特色的权力话语中我们不难听出具有解构力量的反讽之意。同样反讽的是小说的叙事语调，刽子手用一种抒情的语调、一种感伤的语气将自己的施虐行径娓娓道来，强烈地烘托出他对痛苦和死亡的变态反应——不是同情和恐惧，而是享受。他在这封带有自白意义的书信中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各种刑讯方式，仿佛要再次体验施虐的快感。这的确是在思想上重温快感并延长快感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表现出刽子手对自己施虐对象的一种依赖，同时，这封信还是对受害者父亲的一种精神

施虐，因为刽子手赤裸的告白一定会给他带来巨大的伤害。心理的病态折射出社会的病态，它们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心理氛围。

塑造“刽子手”这样的人物意在表明，作品表现的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普遍的心理现象。这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欲望深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是一种恒常存在于人心理中的潜在侵略倾向。在一定的条件下，潜在的会变成现实。持久专一地激活心理中的毁灭冲动会使集体无意识挣脱意识的监控，而集体无意识的解构冲动一旦不受监控便容易变成倾向于仇恨与恶的可怕力量。叶罗菲耶夫展示了无意识脱离意识的结果：意识出现倒错，把恶视为善，人身上施虐本能占据上风，社会实践毫无人性。作家感兴趣的不是个案，而是群体的、被视为常规的现象。

而且，作家对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万恶之源”的考察是超越意识形态的，这种人性之恶不独为苏维埃制度下的苏维埃人所有，而是属于地球上存在的每一个人。世界文学中一系列刽子手形象，比如《索多玛一百天》（萨德）、《死刑之邀》（纳博科夫）以及《杀人是我的职业》（麦尔勒）等作品中的刽子手都能在《小鸚鵡》中找到投射。这也证明了作者不是在单独写某个时代的刽子手，而是在写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侵略-嗜血倾向。（未完待续）

Russia's Flower of Evil (I)

——On Victor Erofeev and His Post-humanism Literature Works

WANG Zong-hu

(Eurasian Department of Luoyang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Victor Erofeev is a quite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As a typical post-modernist writer, he uses the two swor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creation to challenge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ethical tradition of sociology. With the help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era and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he Western counterparts, he makes a deep excavation of the evil of the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evil human nature, he gradually subverts the myth of humanity, which started from the Enlightenment era but intensified increasingly until the Soviet era, thus dissolving the anthropocentric arrogance and conceit. Inheriting Dostoevsky'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nature, he has created new post-humanitarian ideas, which brings fresh blood into the traditional Rus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Victor Erofeev; Post-humanism; dispel the myth of humanity

收稿日期: 2010-03-28

作者简介: 王宗琥（1970-），新疆石河子人，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文化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刘 钺]